

第二章 文獻檢閱

文獻檢閱部分將首先檢閱相關外商直接投資理論，發現共可分為兩種觀察角度。一從企業內部所具有的優勢出發，討論當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的各種方式。第二類途徑則探討 FDI 地主國所具備的區位優勢，將如何對外商直接投資造成影響。再者則整理目前實證研究發現，並做為發展本論文模型變數之用。

第一節 外人直接投資相關理論

關於 FDI 形成之理論眾多，且各有不同切入考量。以下整理國際投資之理論，並說明其套用於中國大陸外人直接投資發展的適切度。

一、外商直接投資理論

(一) 壟斷優勢理論

海默 (S.H.Hymer) 為該理論的創立者，他認為企業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能夠獲得所有 (特別是技術) 生產要素，無法形成對其他企業的任何優勢。但對外直接投資所面對的海外市場，為不完全競爭市場，因為產品與生產要素、規模經濟、關稅與政府介入等因素影響，使得對外投資廠商能獲得一定的壟斷性，從而促成 FDI 的形成。海默也認為，之所以跨國公司採取直接投資方式以取得經營活動的控制權，而不採取諸如技術轉移與出口等國際經濟行為的原因有二：1. 由於地主國的關稅壁壘，直接投資較出口有利。2. 技術出口無法獲得全部收益，相對的直接投資可以控制經營，以得到更多營利。

壟斷優勢理論說明瞭許多跨國性公司的投資行為。舉例來說微軟所掌握的先進技術，具有高度的壟斷性，因而能夠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但就中國實際國情而言，該理論雖能解釋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動機，卻無法說明許多中小企業（例如最早進入中國設廠的台灣廠商）的投資行為，對中小企業來說，並不具有高度的壟斷優勢，無論在資金與技術上，皆無法與大型資本相比。此點亦為壟斷優勢理論缺乏之處，即僅以廠商本身既有之推力出發，而未考慮地主國擁有之拉力。

（二）內部化理論

Buckley & Casson (1976) 提出的內部化理論，借用了交易成本概念作為其核心論證，該理論認為企業為了保護其關鍵性中間財，避免受到市場不完全的影響，從而採取將原本外購行為內部化的投資策略，所謂關鍵性中間財可視為企業的核心技術，特點為形成時間長、研發費用大、可提供企業的壟斷性優勢...等。也因為該關鍵財能為企業帶來可觀的收益，若透過外部交易同時並無法監控交易方的行為時，便會產生巨額的損失。於是為了避免此情況發生，採用內部化符合理性及極大化利益的基本原則。

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論證為何跨國企業沒有採取技術移轉與出口等策略，因為只要內部化效益大於外部市場交易，以及內部化所需成本，企業便會選擇進行內部化投資。但就理論缺陷而言，與壟斷優勢理論相同，內部化理論只說明企業進行內部化的因素，但為何要進行國際性的內部化投資則未能解釋。同時，在各國各地吸引投資的條件皆不盡相同的環境中，為何選擇在甲地進行內部化跨國投資，而非乙地？也就是缺少以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為出發點的思考。

(三) 比較優勢理論，又稱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以國際分工和比較成本原理來分析國際間的直接投資，小島清(1978)研究 60 年代至 70 年代日本海外投資行為，經過與美國海外投資產業的比較，發現美國的對外投資屬於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採用 FDI 而非出口的選擇，將造成美國貿易順差的損失；但日本的對外投資則相反，不僅沒有取代出口，反而帶動相關連產品的出口。因此小島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於比較劣勢的產業，而接受投資的地主國又具有優勢的產業開始，以互補性比較優勢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四)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則擺脫了個體的廠商層面。將焦點關注於國際經濟環境的循環上。Vernon (1966) 發現美國製造業的對外投資特徵，與產品生命週期息息相關。他將產品生命週期分為產品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在創新階段，已開發工業國家藉由強大的資本發展技術，將商品集中於國內生產，賺取壟斷利潤。一方面產品技術尚未成熟，留在國內生產利於改進研發，另一方面因壟斷性利潤存在，有助於成本的快速回收；而在成熟階段，因為商品的標準化作業程式已完善，及需求擴增造成需求的價格彈性上升，企業追求降低生產成本為考慮的首要因素。此外，也因為其他國家關稅的抵制，於是向生產成本相對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以彌補出口減少的損失；到了標準化階段，企業寡占優勢不復存在，此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更低的生產區位，於是勞動力資源豐饒且工資低的發展中國家是國際直接投資選擇的較佳地點。

產品生命週期觀點適切地符合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過。但與前述理論相同，雖然以國際經濟分工的角度論證 FDI 的移動，乃以核心技術國朝向發展中國家變化。不過仍缺乏地主國區位因素的討論，如果以簡單

的尋求便宜勞動力決定 FDI 最終流向，仍不足以反映為何具有相同勞動力優勢的國家，卻無法吸引相同數量直接投資的現實。

二、區位優勢理論

區位優勢理論內容相當多元，除折衷理論初步地將地主國優勢，納入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討論範圍之外。尚有以集聚經濟、市場經濟學派、地主國經濟制度等多種角度進行的論證，皆對本論文之研究設定具有啟發作用。

(一) 折衷理論，或稱所有權-區位-內部化典範

(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 OLI)。

Dunning (1988) 結合各種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提出著名的折衷理論。理論核心為任一跨國企業可能具備三類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而跨國投資便是依據該三種優勢的組合，所做出的政策選項之一。在該理論中認為的區位優勢，則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出口阻礙，而只能選擇直接投資。或者地主國存在將使投資比出口或技術轉讓更有利的優勢。前者如關稅和非貿易壁壘；後者如勞動力成本相對便宜和吸引外資優惠的政策等。

同時 Dunning 解釋跨國公司在技術移轉、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三種方式之間的選擇依據。若跨國企業擁有技術優勢但無力內部化，也不能利用國外區位優勢時，將選擇技術轉移；如企業擁有技術優勢、並且具有內部化能力、則可選擇直接出口；最後，若技術優勢、內部化優勢與區位優勢同時兼備，則便選擇直接到海外市場進行直接投資。由此可見地主國的區位條件，是企業能否進行海外投資的必要條件。Dunning 理論中亦提及的

諸多要素，例如關稅壁壘與優惠政策，以及勞動力成本等，亦對之後討論多所啟發。

（二）聚集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cs）理論

聚集經濟理論始於德國經濟學家韋伯（Alfred Webber）在1909年出版的《區位原論》中的第一部分《論工業區位》中，韋伯認為產業聚集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其產生的外部經濟性，例如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的共用，得使企業享有更多收益與節約成本。他同時也將產業聚集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企業本身的規模擴張，引起產業集中化。第二階段則依靠大企業以完善的組織方式集中於某地，以吸引更多同類企業出現。爾後，法國經濟學家佩魯（Perroux）提出的增長極理論，則以地區的主導產業為核心，認為一個地區要實現區域經濟增長，關鍵在於能否建立一系列推動性工業。¹³ 另外，勒施（August Losch）於《經濟空間秩序—經濟財貨與地理間的關係》一書中，討論相同與不同產業聚集原因，相同產業聚集原因有三，擴大市場規模，節約生產費用、易與供應源接近、可使市場需求集中；不同產業則因基礎設施共用，以及企業聯合帶來的產品多樣性，可吸引更多消費者等因素而聚集。最後，艾薩德（1959）提出的產業綜合理論，解釋產業聚集的動態過程，他認為產業聚集若發展到一定階段，由於區域內要素價格特別是土地價格變動，將引起競爭，產生不利於聚集的結果。

隨後關於產業聚集的討論，集中於經濟外部性上。當產業聚集發生時，將帶來熟練的勞動力市場、先進的附屬產業與改善基礎設施的好處。艾利森與格萊澤（Ellison & Glaeser, 1997）認為產業聚集會帶來技術溢出等外在優勢，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波特（Porter, 1990）

¹³ 這種推動性工業可以透過國家政策與地方政策自上而下的完成，將政府力量的納入產業發展的討論中。

則以「鑽石模型」¹⁴ 說明某地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外人直接投資，在於其擁有發達的基礎設施，特定服務與熟練的勞工，良好的區域形象與大規模產業集中。

(三) 制度學派

理論著重於地主國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各項制度安排，將如何影響外人直接投資。舉例來說，安哥多 (Agodo, 1978) 研究美國製造業在非洲的投資狀況後，發現其與地主國地方政府規劃創造出來的有組織的經濟環境緊密相關。中國學者魯明泓 (1999) 在「制度因素與國際直接投資區位：一項實證研究」一文中，分析影響 FDI 的四大制度要素—國際經濟制度安排、經濟制度、法律制度與企業運行的便利性。¹⁵ 結果發現地主國所創造的經濟自由環境，對外商的直接投資最具影響力。黃智聰、李世聰 (2007) 研究中國大陸三資企業增值稅率，結果發現中國西部地區的稅率愈低，愈能吸引外商進入投資。高安邦等 (2005) 針對中國地方政府效率與外商直接投資的關係，亦驗證制度安排對投資的作用。

四、市場經濟學派

市場經濟學派重視市場的接近性、規模大小與增長潛力等。認為越接近目標市場，就代表能獲得更低的運輸成本、資訊搜尋成本。此外目標市場若具有市場潛力，也越會吸引跨國直接投資進入。根據上海美商會及博思艾倫諮詢公司發佈的《中國製造業競爭力研究 2007-2008 調查報告》，說

¹⁴ 由四大要素組成：1.生產要素條件；2.需求狀況；3.主體產業與相關產業；4.企業戰略、結構與競爭。四大要素組成國家競爭環境，使廠商相互作用，產生競爭力。

¹⁵ 國際經濟制度安排包括：地主國參與的經濟一體化組織、簽署的雙邊貿易保護條約、貿易壁壘及對外資的態度；經濟制度包括：地主國市場發育程度、金融外匯制度與經濟自由度；法律制度包括：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法律完善程度；企業運行便利性則包含：企業運行障礙、政府清廉與稅收制度。

明在國內設廠從事製造的 83% 的跨國企業，並無外遷打算。¹⁶ 可見地主國的內需市場與投資間的關連性。國內外文獻也有許多針對地主國市場要素，如人均 GDP、相對勞動工資等進行研究，於下節詳盡介紹與整理。



¹⁶ 〈看中內需市場 83%製造企業拒絕遷出中國〉，《星島環球網》，2008年9月2日，
<http://www.stnn.cc:82/chinafin/200809/t20080902_857736.html>。

第二節 外人直接投資實證文獻回顧

在英文文獻方面，Broadman 和 Sun(1997)分析 1985~1992 年中國大陸各省的數據，將多元迴歸模型中的各變數取對數，運用 OLS 進行估計，結果顯示 GNP 對 FDI 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良好的基礎設施¹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成年文盲比率有負向而且顯著的影響、職工工資有正向但不顯著的影響、地理區位¹⁸有正向顯著的影響；Dees(1998)以修正誤差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市場大小對 FDI 值有正向顯著影響、相對實質工資有負向顯著影響、對外開放性¹⁹有正向顯著影響；Coughlin 和 Segev(2002)使用 OLS 迴歸分析法，探討每年流入中國大陸的 FDI 與區位因素的相關性，結果發現各省的生產毛額及沿海地區對吸引 FDI 有正向影響、平均年度職工薪資與文盲率²⁰有負向影響；Sun Tong 和 Yu(2002)以中國大陸各省區的 panel data 為樣本，採用固定效果模型分析。正向顯著影響的變數為，市場大小、基礎建設及對外開放程度，負向顯著影響變數則是工資率與群聚效果。²¹

此外，以生產成本與市場要素作為觀察的變數，幾乎是每篇關於中國大陸外資研究的必備要素，其中不外乎勞工工資以及市場的開放程度高低兩項。相關研究包括林俊儒(2003)，將中國大陸區分為東部沿海、中西部地區，並以 1992 年至 2001 年的 panel data 分析，比較後的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的外資較重視市場區位因素，而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因素為主，例如低廉工資；而郝麗(2005)的研究，則將長三角與珠三角相互比較，試圖找出為何外資資金近來有從珠三角向長三角轉移的現象。研究歸納原

¹⁷ 基礎設施以三項指標衡量：公路密度、高級路面的公路密度、鐵路密度。

¹⁸ 地理區位以虛擬變數表示，沿海省份為 1，其他省份為 0。

¹⁹ 以各國向中國出口的出口額衡量。

²⁰ 文盲率計算方式為 15 歲以上文盲或半文盲佔總人口比例。

²¹ 群聚效果解釋變數計算方式為，歷年 FDI 存量除以歷年國內投資存量。

因有三，首先，珠三角相較於長三角，對內經濟腹地輻射力不強，使市場導向型外資轉移；第二，珠三角由於開發較早，相對來說投資與營運成本亦成長較快，不利於低成本優勢企業發展；最後則因長三角科技研發能力較珠三角佔優，因而造成外資的移動；鄭惠珍(2005)以 1993 年至 2003 年採用世界各國投資中國的 panel data，配合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 Model)與隨機效果模型(Random Effect Model)，比較北京、上海、廣東三地的決定投資要素。結果發現，相對工資率、相對匯率與相對借貸成本為負向顯著關係，貿易依存度(雙邊貿易規模)為正項顯著關係；袁持平、謝文建(2003)針對珠江三角洲八個主要城市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也顯示了人均工資水準與 FDI 投資具負向顯著關係。

再者，觀察制度面如稅率變化與政府政策等文獻，包括高安邦等 (2002) 研究中國大陸各省市的政府效率，結果發現與吸引外資呈現正向顯著關係；胡涵鈞和王紀亮(2005)以 1985~2001 年中國大陸各省市及自治區為 panel data，採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與加權最小平方法進行分析，顯示政策優惠(累計政策優惠區數量)與 FDI 流入具正向顯著關係；羊健(1997)所做的調查研究認為，地區的優惠政策確實會影響外商來華投資的行為；黃智聰、李世聰(2005)研究中國三資企業的增值稅率，對地方吸引外資的影響。結果發現雖然增值稅率的高低只對西部地方產生負相關，但文章中所列之市場保護程度變數，則告訴我們外資企業會因地方政府對本國企業的保護措施，而考慮投資與否；最後，魯明泓在 1999 年發表的文章《制度因素與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分佈：一項實證研究》，以 OLS(普通最小平方法)模型，完整地探討各項制度安排和 FDI 的關係。其中發現，金融管制程度與 FDI 呈負向顯著關係、經濟自由程度為正向顯著、對私有財產保護程度則為正向顯著。以上結果表示地主國的經濟與法律制度安排，將左右外國投資者的投資態度與行為。

產業群聚效應亦為近年熱門討論焦點。陳哲正(2003)，採用有條件 logit 模型配合田野訪談調查，針對 19 家台商製造業投資的地區資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台商對大陸投資重視的是聚集特性，特別是在上下游產業鏈的整合效果上。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國家政策上則呈現不同產業別各自歧異的現象。另外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發現，電子業特別重視產業聚集的區位因素；李非和李繼翔(2004) 以逐步迴歸法分析台商赴中國大陸各省市的投資數據，研究期間為 2002 年至 2003 年 6 月。結果發現，在群聚效果方面有正向顯著影響。²²另外，陳恩、汪書軍、羅睿(2006)的文獻也有相類似結論，作者以台商作為研究主體，發現台商的聚集經濟²³效果是投資行為中最重要的因素，市場因素次之。然而，回顧文獻時亦有持相反意見者。例如陳銘宏(2006) 所做的研究則與前述結論不同，若以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的聚集效果²⁴為比較主體，群聚效應為負向顯著關係，說明長三角資金聚集度若愈高，外商愈不會選擇該地進行投資，出現資金排擠的效應。

²² 其他變數結果包括；工業企業數、市場化程度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經濟基礎設施(交通網路密度)與對外開放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社會基礎措施(選取多項民生產業並加總後，除以 GDP)則為負向顯著影響。

²³ 聚集經濟變數設定為：各地區工業企業數(家)。

²⁴ 聚集效果計算方式：將長三角的 FDI 存量除以珠江三角洲的 FDI 存量。

表 2-1：中國大陸 FDI 影響因素的實證文獻整理

研究者與題目	研究範圍	樣本期間	顯著變數
Broadman 和 Sun(1997)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85 年~1992 年	市場規模(+) 基礎設施(+) 地理區位(+) 文盲率(-)
Dees(1998)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中國大陸各省	1983 年~1995 年	相對工資(+) 市場規模(+) 開放性(+)
Coughlin 和 Segev(200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 study”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90 年~1997 年	市場規模(+) 工資率(-) 教育品質(+)
Sun Tong 和 Yu(2002)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ross China”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86 年~1998 年	市場規模(+) 基礎設施(+) 開放程度(+) 工資率(-) 群聚效果(-)
高安邦、黃智聰、潘俊男(2002) 中國大陸地方政府效率與吸引外資之研究	中國大陸各省	2000 年~2004 年	政府效率(+) 工資率(-) 基礎設施(+) 群聚效果(+)

			對外經濟開放程度(+) 市場保護程度(-) 人均購買力(+)
黃智聰、李世聰(2005) 中國三資企業增值稅率對地方吸引外資之影響	中國大陸各省	2000年~2005年	基礎設施(+) 市場保護程度(-) 群聚效果(+) *增值稅率對西部地區為負相關
林俊儒(2003) 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之決定性因素實證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92年~2001年	市場規模(+) 工資率(-) 高品質勞動供應(+) 對外開放程度(+)
陳哲正(2003) 台商製造業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之研究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99年~2001年	整體製造業聚集(+) 商業服務聚集(+) 外商工業企業聚集(+) 港澳臺商工業企業聚集(+) 高等教育人數比例(+) 高速公路集中度(-) 所得稅負擔(-) 國家高新科技政策(+)
胡涵鈞、王紀亮(2005)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地區分佈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86年~2001年	市場需求(+) 郵電通訊水準(+) 國際貿易(+)

			產業結構，工業化程度(+) 優惠政策(+)
陳恩、汪書軍、羅睿(2006) 台商投資大陸的區位選擇分析與實證研究	中國大陸各省市	2004年	市場規模(+) 聚集經濟(+)
羊健(1997) 外商來華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及政策導向	中國大陸各省市		社會秩序(+) 市場潛力(+) 勞動力成本(+) 基礎設施(+) 地區優惠政策(+)
李非、李繼祥(2004)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的實證研究	中國大陸各省市	2002年	群聚效果(+) 市場化程度(+) 經濟基礎設施(+) 經濟開放程度(+) 社會基礎設施(-) 人才儲備變量(+)
魯明泓(1999) 制度因素與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分佈：一項實證研究	中國大陸各省市	1994年~1996年	國際經濟制度：貿易壁壘(-)、對外資態度(+)、雙邊投資保護條約(+)、地區整合(+) 地主國經濟制度：市場發育程度(+)、金融管制程度(-)、經濟自由程度(+) 地主國法律制度：私有財產保護程度(+)

			企業運作障礙：企業運作障礙(-)、清廉程度(+)
郝麗(2005) FDI 從珠三角向長三角轉移的投資環境因素分析	長三角—上海、南京、蘇州、無錫、杭州 珠三角—廣州、深圳、東莞、珠海	1992 年~2002 年	市場消費規模(+) 勞動力成本(-) 現存人力資源狀況(+)
陳銘宏(2006) 外商在中國投資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 長三角與珠三角的比較	長三角、珠三角	1978 年~2003 年	市場規模(+) 基礎設施(+) 群聚效應(-) 勞動成本(-) 經濟外向性(+)
鄭惠珍(2005) 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之決定因素— 北京、上海與廣東之比較	北京、上海、廣東	1993 年~2003 年	相對工資率(-) 雙邊貿易規模(+) 相對匯率(-) 相對借貸成本(-)
袁持平、謝文建(2003) 珠江三角洲地區外商投資環境評估	珠三角	1991 年~2000 年	國內生產總值(+) 第三產業產值佔 GDP 比重(+) 人均工資水準(-) 地方基礎建設(+) 外資出口佔總出口比重(-)

說明：括號內為“+”代表該變數與 FDI 呈現正向顯著關係；括號內為“-”代表該變數與 FDI 呈現負向顯著關係。